

邵洵美与巴金的书缘

周立民

1926年5月，诗人梁宗岱在巴黎送给邵洵美一本卢梭的《忏悔录》，书的环衬页上，有梁宗岱的题词：“洵美由英归国，道经巴黎，以此持赠，并藉以寄我火热的相思于祖国也。宗岱一九二六，五，二一法京。”抗战时期，这本书在重庆为巴金所得，并一直珍藏，晚年捐给上海图书馆。一本书，三位中国现代作家，这也算是一段饶有兴趣的佳话。

巴金与邵洵美的书缘并未止于此，他还买过另外一本邵洵美的藏书。那是劳伦斯的中篇小说《死去的人》(THE MAN WHO DIED)，一本细条的十六开精装书，毛边本，伦敦MARTIN SECKER有限公司1931年出版。正文前有标注：此版本限印2000册，仅在英国和美国发行。另有说明，这个小说最初的标题是《逃亡的公鸡》，现在的题目是作者死前不久决定的。八十八年过去了，这本书已经有些陈旧，墨绿色的布面已经失去它最初的颜色，但是封面正中烫金的一只展翅的水鸟的标志仍然金色饱满。书的前环衬靠近订口处有邵洵美以浓墨工整地签下的“洵美”二字，下面钤一方闲章，印文是“自得其乐”。这清楚地表明，此书原本为邵洵美藏书。书的扉页上有一个用钢笔书写的大大的“金”字，这是巴金藏书中的习见签名。它什么时候归巴金所有呢？在封三处，有一枚“外文旧书门市部”小条章，上面标着售价1元。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是旧书店、外文书店的常客，此书应当归于那时。

这不是邵洵美的普通藏书，他还为它写过书评。劳伦斯，是邵洵美颇为关注的一个作家，1934年，他撰文《读劳伦斯小说——复郁达夫先生》，文中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前后曾读过五次”，并藏有劳伦斯私印初版本和后来出版的廉价普及本。他还透露：“我在前年的秋天，曾译了他的一部中篇故事《逃走了的雄鸡》……”(《读劳伦斯小说——复郁达夫先生》，陈子善编《洵美文存》第2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它正是这本《死去的人》。1931年10月，邵洵美在《新月》第3卷第10号上发表书评，认为劳伦斯要表达的是：“耶稣不应当为了想贯彻自己的思想而便把他的肉体牺牲了应有的享受以经历不应有的痛苦。”(《逃走了的雄鸡》，《洵美文存》第215页)从相关文字看，邵洵美在1932年已经译完这部小说。1934年《美术》杂志第1卷第1期还曾刊出过画家张光宇为此书设计的封面，画面上是一个像邵洵美模样的人，赤着脚，捧着一只公鸡。不知道什么原因，此书当时没有出版单行本，直到1938年才在《纯文艺》杂志上发表，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也仅仅是刊出的两期，不过六七千字篇幅。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有幸欣赏到邵氏译文的全篇。我还注意：在《新月》月刊上写书评，邵洵美依据的并非后来巴金藏的这本书，而是题为《The Escaped Cock》这个本子，是巴黎Black Sun Press出版的，也就是说，此书，他至少有两个版本。一本喜爱的书拥有多个版本，这也是巴金的习惯。

巴金与邵洵美的另外一桩书缘，是邵洵美创办的第一出版社为巴金出版了一本《巴金自传》。这是“自传丛书”中的一本，邵洵美听了胡适鼓动，认为“中国缺乏传记文学”，便起意出版“自传丛书”，这套书实际出版了沈从文、张资平、庐隐、巴金和许钦文的五种，邵洵美为《巴金自传》写出版介绍是这样：

巴金先生的作品，充满了人间的苦闷和哀愁，但有一贯的对人间的爱的感情流注着。他这一种对于人间的爱，对于真理的热情，是怎样孕育产生的呢？先生为四川世家子，自上层阶级，每多革命先锋，因他们才能真知灼见自己一类的罪恶，而同情于被压迫者。因为厌恶自己，人生途中便到处都是悲哀，又因为同情于他人，所以有爱的流贯。一切文章作品，都和作者的环境有很深关系的。《巴金

自传》读过之后，你便能真个了解巴金的人和作品了。这不仅是在广告的文词，但有真正的广告价值，也应是真正的广告。(原载1934年11月3日《人言周刊》第1卷38期，现收《洵美文存》第298页)

巴金对这本书并不满意。很重要的原因是书名由《断片的回忆》被改成《巴金自传》。估计编者是为了统一丛书各本的书名，也是为了招徕读者才这么做的。偏偏巴金他向来不喜欢做名人，更不大喜欢名人的做派。还有些细微的原因，“我不满意它，因为除了错字多、售价贵以外，它还比我的原稿少一章，那是被审查会删去了的。”(《忆》后记，《巴金全集》第12卷第4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售价是大洋六角，我查了一下后来出版的《忆》，内容比此书几乎多一倍，平装三角，精装四角五分，虽然《巴金自传》纸张要好一些，相比之下还是贵了些。删去的文章是《信仰与活动》，也是书中意义非凡的一篇，作者都不高兴自己的书残缺不全。1936年，改名《忆》，增补了几篇文章，巴金在自己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此书的新版，这也是以后通行的版本。而以《巴金自传》为名的这本，仅印一版，倒成了稀罕版本。

这是巴金与邵洵美的“隔空”交往，在1930年代，他们同在上海，是否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呢？1936年2月出版的《六艺》杂志中有一幅鲁少飞画的《文坛茶话图》，上面“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芸君邵洵美”，邵洵美请客不是稀奇事，他能否请座中诸人人才是一个问题。退一步讲，即便是在画家设计的虚拟场景中，巴金和鲁迅也是站在离邵氏很远的另一端。巴金和邵洵美，显然不在一个朋友圈内，不过，他们的朋友圈中却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此说来，两个人能否相遇呢？我只能说有这个可能，可是我还没有找到具体证据。近年来陆续发表的傅彦长日记中，对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交游情况记载甚多，其中涉及邵洵美之处很多，谈到巴金的也有。可是，关于两个人碰面，只有一次疑似的记载。那是1932年7月17日日记：“到新雅、中社、海青，遇王礼锡、徐仲年、钟独清、荣玉立、邵洵美、谢寿康、徐悲鸿、陈抱一、汪亚尘、陈春融、华林、田汉、李宝泉、关紫兰、火雪明、巴金、索非、徐调孚、曾仲鸣、吴曙天、钱君匋、顾均正、孙福熙、章衣萍、周乐山等。”(《现代中文月刊》2018年第1期)那一天，傅彦长是去了三个地方遇到这些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分别在三个地方，而非同一处。他的日记中，记载过巴金的一次请客：“到界路中国银行、安乐园、南京影戏院、新雅(晚餐，巴金请，列席者林徽音、叶秋原、李青崖)、大华跳舞厅(林、叶两人同往)。”(1933年3月6日日记，《现代中文月刊》2018年第5期)这里有好几位都同邵洵美来往很多，但是巴金请客名单中偏偏没有邵洵美。或许可以判断，两个人即便平日里有来往，也算不上比较密切的朋友。不过，邵洵美在文章中曾提到巴金和他编辑的图书。谈文学批评时，他说：“譬如茅盾或是巴金的一部小说，作者的抱负一定非凡，但是经批评家一说是要在暴露某一阶级的罪状，或是在要显示某一阶级的功劳时，它的意义便确定了，便有了限制了，它便死了。”(《伟大的晦涩》，《一个人的谈话》第15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7月版)谈到沈从文的《八骏图》，邵洵美说，此书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此书装潢很幽雅，尺寸也可爱，足见编辑丛书的巴金先生的趣味”(《不朽的故事》，《一个人的谈话》第1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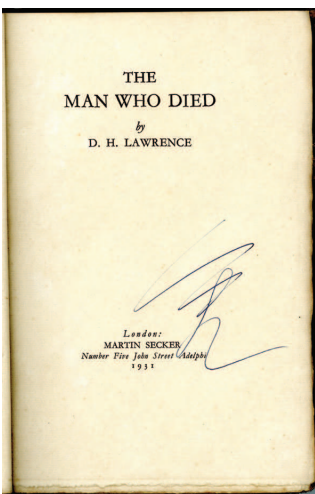
1963年，巴金与邵洵美倒是因为书又有了一次来往。当年8月2日，巴金在日记中记：“邵洵美来信借书。”(《巴金全集》第25卷第278页)我未能找到这封信，从当年8月20日巴金日记再记中大致可以了解此信的内容：“复邵洵美信，说我没有Loeb's, classics希腊、拉丁名著英文对照本。”(《巴金全集》第25卷第285页)不知道邵洵美要借的是“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哪几种，这套书是美国人詹姆斯·洛布(James Loeb)主持印行的，他组织英美古典学专家将希腊、罗马文化原典译成英文，为了体现准确性，这套书采取的是希腊、拉丁语原文与英文左右页相互对照的方式，而且每卷都有专家的导读和详尽的注释，这正是做翻译需要的版本。邵洵美借书，也是那段时间做翻译参考。此时的邵洵美没有公职，只有译书为生，1958年，他遭受不明冤狱，身陷囹圄，直到1962年4月才无罪释放。他的夫人盛佩玉曾写信向女儿描述刚出狱的邵洵美的状况：“他进去前胖胖的，出来骨瘦如柴，头发雪白，佝偻着身躯，缩得小小的，一动就喘……”家徒四壁，邵洵美环顾四周之后说，“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没有了，不足惜。”幸好儿子为他保留了百来本书，邵洵美看到一直使用的那本英文辞典Webster Dictionary，十分高兴，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宝贝，有这本就行。”(转引自邵缙红《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第370页)

在有关方面的照顾下，邵洵美为出版社译书，出版社每月预支定额的稿费，维持生活，那时做翻译工作，邵洵美最苦恼的就是找资料书。他曾公开抱怨过：“翻译这部诗剧，还有一个极大的困难，这也同时是翻译一切外国古典文学所存在的困难。那便是参考材料问题。我国各处图书馆所保存的关于外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大部分不过是供给学校教材的应用；私人的收藏，又是各人凭着各人的爱好，零零碎碎，没有系统。”(《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译者序，《洵美文存》第415页)邵洵美写信向巴金借书，这说明，他确实急需，否则不会向来并不密切、且身份和地位已经有很大

2019年4月11日 傍晚于武康路

笔会

张光宇为邵洵美译作《逃走了的雄鸡》设计的封面图



年版英文本扉页上的巴金签名和环衬上邵洵美的签名

科学与自我修养

朱生坚

果不其然，黑洞照片一出，立刻被玩坏了。而我们在哈哈一笑之后，除了佩服制作者的脑洞大开之外，关于黑洞，还是跟以前一样，只是略知一二，或者，还是一样的茫然无知。

要是这个世界上最出了什么吸引眼球的电影、小说，或者国际政治、新闻事件，乃至传闻、八卦，如果对它毫无了解，不能在电梯里随便聊上两句，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不够时尚，有点OUT了。可是，对于黑洞，或者青蒿素，以及诸如此类的科学知识的刷新，就算完全不知道，也无所谓。它们好像跟日常生活非常遥远，而且好像过于深奥，非得有相当专业的知识背景才能知道个大概，那就不妨交给科学家、专业人士好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误解。

在今天，AI时代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所有人的家门，科学常识理所应

当成为所有人的自我修养的一部分。说起来，人们之所以会有那样的误解，或许是因为我们曾经把科学供奉在神坛上，貌似高不可攀，需要仰视才能看见；乃至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在自然科学面前，也会自愧弗如，因为自己的成果无法验证，不可复制，显得很“不科学”。在日常生活中，“要相信科学”就像一句咒语，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足以喝住某些人蠢蠢

欲动的迷信思想——殊不知，这句话恰恰很不符合科学精神。科学从来不是让人去“相信”，去膜拜的，而是让人去怀疑、检测、实践、验证、颠覆、更新、重构……而所有这一切原本是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试着去做的事情。应该是时候改变这种误解，改变科学脱离生活、高高在上的状况了吧。让科学成为所有人的自我修养的一部

分，也就是说，把普通人可以、应该掌握的科学知识，纳入普通人的知识结构之中。尤其是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还是相当低的社会，“科普”依然任重道远。要不然，很多梦想，都无从谈起。此外，这也意味着，应该更新我们对于个人的自我修养的理解。我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处理的是客观世界的东西。至于精神生活、思想修养、价值观念，那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事情。两者互不搭界。显然，这也是一种误解。怀特海在谈到现代科学的起源时说过，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希腊的伟大悲剧家们。而今天我们所有人对于世界、个人、生命的理解，也根本不可能离开自然科学。对此，应该有非常自觉的认识，不要非得等到有那么一天，芯片植入人体、植入大脑之后，才发现科学已经如此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一切的认识方式。

二十年前，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管锥编》的节译本(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译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翻译这部巨著绝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但艾朗诺还是义无反顾，因为“《管锥编》已被公认为钱锺书对中西传统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译者序)。艾氏专攻唐宋文学，按理说，翻译《谈艺录》会更为得心应手，但还是优先考虑了《管锥编》。他在序言中解释道：“在钱氏全部著作中，《谈艺录》显然最接近《管锥编》，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显著。后者论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正如英译本副标题‘关于思想与文学的札记’所显示，钱锺书讨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唐宋以来的中国诗学，而是涵盖了整个中国人文传统。他的美学考察从文学扩展到了视觉艺术(书法和美术)，他也更有意于建立文学和哲学、宗教之间的联系。《管锥编》采用了更大数量和范围的比较。钱锺书对西方文献的征引在《谈艺录》中已很突出，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他大大增进了对西方传统文学和现代批评的理解和把握，对比较研究效用的信心也更坚定了。更大的不同在于，同样是随笔和札记体著作，《管锥编》中的钱锺书更像一位批评家和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见解，左右逢源，张弛有度，更不用说视野的宽广了。我们不必同意他后来视《谈艺录》为‘少作’的谦逊，但《管锥编》的确使我们领略到了更为老成阔大的境界。”艾朗诺的选择和翻译工作体现了一个优秀学者的“公心”。

所以，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产品，西方人会注意到，也会主动“拿来”，用不着我们费力而未必讨好地“送去”。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是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都是美国人主动翻译、自行出版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著作的价值。我们有时间、精力和费用，不如多翻译一些外国的好东西进来。

《管锥编》英译本出版后，没有引起1980年代中国国内那样的轰动效应，更没有形成“钱学”热。根据我在Jstor数据库上的初步检索，只有三篇书介，除了陈述书的内容，表扬艾朗诺的翻译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学术评论。自上世纪末开始，张隆溪教授多次撰文，为钱先生和《管锥编》呼吁，希望引起欧美学界的重视，但效果一般。其实早在1983年，法国学者李克曼(Pierre Rychmans)就在《世界报》(Le Monde)上盛赞过钱先生，说他的博学“在今日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无人可以比拟”。其他的赞誉之声也是此起彼伏，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的事实是：作为现代作家的钱锺书在海外的影响更大，《围城》早已被翻译成多种外语。最通行的英译本也是最早的，1979年就出版了，2004年作为“新方向经典”(A New Directions Classic)再版时，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专门写了序言，2014年更上一层楼，被收入西方妇孺皆知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此外，《人·兽·鬼》2011年也有了全译本。

1985年，钱先生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艾柯(Umberto Eco)、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等一同被选为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荣誉会员，表明他的成就已经为海外学界普遍认可。但和其他几位同年入选的学术大师相比，钱先生的影响力却要小得多。艾朗诺在分析原因时指出：“《管锥编》在海外的关注度远不如中国国内。毫无疑问，该书独特的文体和行文造成了这种被忽略的状况。实际上，甚至在中国学者那里，《管锥编》也因纷繁复杂的内容和独具特色的结构而被视为奇书。估计这些原因阻碍了国外专家进入其中开掘宝藏，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唯一对《管锥编》进行阐发的是德国人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二十年过去了，相关论文有了一些，但专著仍然

关于钱锺书的一则史料

谢泳

今年三月间，我在南昌一家书店和读者见面，略谈了一点近年钱锺书研究的概况。交流过程中，南昌大学梁联寿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梁先生说，师文华和他主编的《江西对联集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收有张杰一副联语：“玄之又玄，不外老生常谈事；觉吾所觉，何尽天下古今书”(该书第1087页)。梁先生极热情，将原书此页复印一份给我。

张杰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留在光华附中教书，曾和钱锺书住过同一宿舍。钱锺书研究中，关于张杰史料常见的有两条，一是钱锺书《中书君诗初刊》跋中曾提到，他印此书是“陈君圭张君挺生怱怱”；二是《槐聚诗存》有1938年诗《陈式圭郭晴湖徐燕谋熙照诸君招集有怀张挺生》。

《江西对联集成》中对张挺生的介绍是“张杰(1911—1974年)，字

只有莫芝宜佳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

看来，《管锥编》“走出去”的过程远不如想象得那么顺利。正如艾朗诺所言，问题出在它“独特的文体和行文”。典雅而晦涩的文言文不好理解，太多的引文让人难以招架，更严重的是整本书由一千多则笔记组成，彼此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为了帮助西方学界读懂和欣赏《管锥编》，艾朗诺的译本精选了六十五则笔记并编排成六个专题：一、美学和批评概论，二、隐喻、象征和感知心理学，三、语义学和文学风格学，四、论老子，五、魔和神，六、社会和理想。这样一来，可读性确实大大增强了。可见艾朗诺不光是翻译，也是在归纳和总结《管锥编》的思想。

可以设想，如果《管锥编》不是采用现在这样的体例，而是成系统的专著或论文，它可能早被全文翻译，影响也会更大。其实，钱先生并非不会写西方式样的标准论文。他早年在牛津大学完成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用白话文写的几篇二三万字的长文(后来收入《七缀集》)也是现代论文。这说明他“非不能也，不为也”。他选用文言文和传统的笔记体来完成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管锥编》，可能有多个原因，但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尊重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跟着别人走，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

挺生，号拔群，信丰铁石口人。江西大学中文系教师”。关于此副联语的由来，书中提到张挺生的斋名为“玄觉室”，他在光华附中教书时，“钱锺书先生亲笔为张杰的书斋‘玄觉室’题斋名。回江西后，在匡庐中学赣州分校、大余中学、赣州知行中学、江西药科学学校、江西大学等校任教”。了解张挺生情况，为日后笺证钱锺书旧诗提供一个史源。

关于这副联语，《江西对联集成》系在张挺生名下，我在网上查阅，判断是一副自撰联语。联语巧用“玄”“觉”起句与斋名合为一体。张挺生1974年去世，联语来源，想是据张杰生前回忆资料记录，抑或来自别人回忆资料，记忆常有模糊，难免张冠李戴。钱锺书既为张挺生题斋名，撰联语似也无不可能。细品联语意味，感觉更近旁人口吻，当然这只是一个人的猜测了。